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经济

哈里·施瓦茨著

(供内部参考)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經濟

哈里·施瓦茨著

何 毅 譯

(供內部參考)

Harry Schwartz
**THE SOVIET ECONOMY
SINCE STALIN**

J. B. Lippincott Company,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1965

根据美国利平科特公司 1965 年版译出

• 供 内 部 参 考 •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经济

〔美〕哈里·施瓦茨著

何 毅 译

*

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料室编印

(北京后圆恩寺 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8 · 插页 3 · 字数 187,000

1965 年 12 月第一版 1965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829 定价 (五) 1.10 元

序 言

1964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刚刚开过，苏联报纸就对本国最著名的体育界负责人员和教练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因为他们曾许愿说，苏联选手一定会取得压倒优势的胜利。《劳动报》的埋怨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所许下的四十五枚到五十枚金质奖章和七百二十分在哪儿？结果是令人大失所望的。”这些攻击集中在事先许愿和实际成绩的对比上，而对苏联奥林匹克队所获得的奖章比任何国家都多，并且所获得的金质奖章仅次于美国队的事实，报纸却提得很少。

由于这些文章出现在赫鲁晓夫被撤销共产党第一书记和总理的职务以后，因此外国观察家难免要猜想到，苏联报纸所指的不是奥林匹克的成绩，而是别有所指，它们使用了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赫鲁晓夫和苏联体育教练一样，他许的愿远远超过他取得的成绩。虽然赫鲁晓夫在当权的时候可以不受公众批评，可是一旦下台，他对本人一系列的失败甚或还有其他人的失败就无法推卸责任了。在他下台以后不久，发表了关于他的“轻率计划”和“浮夸吹牛”的隐约的指责，这表明他的继承者的目的是要对他的无能进行一次公开的清算，很像将近十年前他处置已故的斯大林那样。

本书的大部分是在赫鲁晓夫被黜以前写的，但是那个时期赫鲁晓夫在经济上的成功和失败都十分清楚，所以不必由于赫鲁晓夫的被黜而有所修订。不过，我还是努力描述了那些对赫鲁晓夫下台时机或许有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经济问题，并且谈到赫鲁晓夫继承者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些意图的最初迹象。从斯大林逝世到

赫魯曉夫被清洗的年代，克里姆林宮是在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的統治之下。本書試圖對他們的計劃、成就和挫折加以客觀的描述。不言而喻，蘇聯報紙歷來對於一個當權的統治者總是極盡吹捧之能事，而一旦被打入政治冷宮的時候，則給以無情的貶斥。

許多人曾幫助我寫作本書，謹此表示深切的謝意。利昂·赫爾曼慨允通讀原稿並且提出了許多很有幫助的意見。至於書中遺留下來的錯誤，完全由作者負責。喬治·史蒂文斯、斯圖爾特·理查森及其J·B·利平科特公司的同事，使我得以撰寫本書，他們在我寫作的過程中提供了不少幫助。我的妻子魯思·B·施瓦茨，在難熬的寫作期間對我毫無怨言，她還整理了原稿並編制了索引。本書使用的有版權資料，蒙資料所有者同意，謹此表示感謝。作者所服務的《紐約時報》，對於本書內容不負任何責任。

哈里·施瓦茨

1964年12月16日

於紐約斯卡斯台爾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約瑟夫·斯大林公司	1
第二章	全面概观	23
第三章	馬林科夫的胜利和失敗	46
第四章	几个好年头——1955—1958 年	65
第五章	赫魯曉夫下台的經濟因素	113
第六章	对外經濟关系	178
第七章	到 1980 年进入共产主义?	222
附录	1965 年的苏联經濟	234
注 释		238

地 图

新经济区	(插頁) 142—143 之間
------	-----------------

图 表

一个典型的国民經济委员会的組織 (伏尔加—維 亞斯克国民經济委员会的組織)	81
1964年初一个典型的苏联国家生产委员会的組織 情况表	(插頁) 144—145 之間
1964年初苏联中央經济管理机构組織情 况表	(插頁) 146—147 之間

第一章

約瑟夫·斯大林公司

1963年12月，苏联总理兼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魯曉夫面对着他的党中央委员会，回答了对他的批评。他说，有些人怀疑他該年从西方购买成百万吨的粮食是否明智，这些人指出苏联前些年的收成甚至比1963年还低，可是还能够出口粮食。赫魯曉夫問道，但是这些人是否想到过那些出口的代价？他追述說，1947年，虽然我国有部分地区“人民害浮肿病，甚至餓死”，斯大林仍然出口粮食。

赫魯曉夫总理的話表明，斯大林即使已經死去十年有余，他的幽灵仍然糾纏着苏联的經濟和社会。无论什么驅邪术——迅速改变制度，迅速提高产量，甚至公开譴責这位已故的暴君——都无法驅除这个鬼魂。六十年代的苏联經濟，从其力量或弱点上看，从其成功或失敗上来看，显然仍是斯大林主义經濟的产儿——T·H·里格比称之为約瑟夫·斯大林公司——而这种經濟的創造者早在1953年3月5日就死去了。

斯大林統治了苏联近三十年，这些年代是該国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成型时期。他在二十年代中期取得統治权的时候，苏联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薄弱的工业基础深深地淹沒在約二千五百万个体农戶的大群体之中，这些农戶构成人口的絕大部分，并且在經濟上居于統治地位。当死神終於抹掉他对克里姆林宮的控制的时候，斯大林的俄国已經是地球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并且是除美国以外唯一拥有巨大核武器威力的国家。集体化的农业几

乎完全是斯大林創造的，到 1953 年，它已擁有巨大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這兩者和三十年前普遍存在的小農經濟是大不相同的。

到六十年代中期，斯大林已經逝世十多年了，但是，在蘇聯經濟的許多制度上以及實際活動上，都仍然明顯地帶着他的烙印。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 1953 年以來領導蘇聯經濟的那些人，是在斯大林控制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时候受到基本訓練、吸收有關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一些根本觀點的。斯大林以後的俄國統治者，儘管在他們的主人死後就在蘇聯經濟組織和實際活動上進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但是這些改革大部分仍然在斯大林關於集中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概念範圍之內。這些同過去千絲萬縷的關係說明，要理解斯大林死後的蘇聯經濟發展，必須首先弄清楚以前的斯大林主義經濟。

斯大林主義經濟並不是一夜之間形成的，列寧在 1924 年逝世之前就奠定了一些基礎。在 1917 年奪取政權後的最初年代里，列寧把工業、商業、銀行系統，還有其他許多東西都國有化了，企圖由此消滅自由市場和私人經濟活動的一切成份。這種要想很快實現烏托邦的過早企圖所造成的破壞，同流血的內戰所引起的破壞作用結合起來，在全國工農業生產急劇下降之後，造成了普遍的經濟解體和不滿。

1921 年，在俄國經濟崩潰的事實面前，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力能否繼續維持的威脅面前，列寧不得不退卻。他為了挽救局勢，實行了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對私人企業作了廣泛的讓步——私人貿易和私人工業生產合法化，以經濟刺激和市場刺激代替脅迫，努力吸引外國資本家在俄國投資，這才使俄國經濟得以在二十年代里迅速恢復。但是，列寧儘管實行了退卻，他還是將他所謂的經濟“命脈”——基本工業、交通運輸系統、銀行和對外貿易——小心地控制在國家的手中。在 1924 年列寧逝世的時候，俄

国国内的社会主义企业和私人企业两种力量，在一种不稳定的竞争性共处的情况下，互相倾轧，结果如何，尚在未定之天。

斯大林引起世界注意是二十年代中期作为列宁逝世以后统治俄国的集体领导的成员之一。他似乎是个稳健派。他反对托洛茨基和其他人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工业化的大胆想法，并且攻击那些他称之为“工业至上者”的人破坏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盟。列宁逝世以后领导集团中的右翼曾经主张比较富裕和能干的农民有权雇工和积累资本，这种主张有一段时期获得成功，那时斯大林并没有提出重大的异议。^① 斯大林在公开场合表现的形象是一个踏实、通情达理的稳健派——狂热的激进派的敌人，这大大有助于他战胜所有的对手，在苏联社会的各个方面建立个人专政的统治。

恰恰是胜利者斯大林，一旦把托洛茨基和“工业至上者”从自己的道路上清除掉以后，就实行了他们的纲领，这仿佛是历史的嘲弄。二十年代后期以及其后的十年中，他创造了俄国的铁器时代。他制服了工会，使它们成了听他任意指挥的工具，所以他在三十年代强行降低实际工资的时候，没有受到有效的反对。他不顾农民们的拚死反抗，剥夺了他们的小农庄，把他们赶进集体农庄，结果造成了牲畜和其他农业资产的大量摧毁。他把俄国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个最高的目标上：尽可能迅速地工业化，以便使国家作好准备，将来可以同外国敌人作战。

斯大林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使苏联作好准备，这是他念念不忘的事。创造斯大林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尽快地使俄国作好准备，不惜一切代价生产武器和其他必需品，以使俄国成为军事强国，并且能够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取得胜利。1931年，当俄国群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强加的看来无法忍受的沉重负担之下呻吟的时候，苏联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放慢速度，减少

要求人民作出的牺牲。斯大林作了无情而清楚的回答：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

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末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②〔1〕

在使国家工业化作好战争准备的过程中，斯大林只有把他的国家变成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标准极权国家，才能够榨取他所需要的一切牺牲。斯大林主义国家依靠秘密警察的恐怖、奴隶劳动营、绝对的思想控制以及后来被称为“个人迷信”的现象。所谓“个人迷信”就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阿谀奉承，这使斯大林在一切他乐于公开谈论的问题上成了无上的权威。

即使在这段简单的概述中，也不能忽视西欧和美国在苏联早期工业化中的作用。斯大林曾向这些国家购买先进工艺技术，他需要这种工艺技术来使苏联成为现代工业强国。成千名西方工程师、化学家、建筑师被聘到苏联帮助设计、建设新工厂，而且最初时期由他们管理，另外还训练了具有必要技术的苏联专家。斯大林从西方购买了价值千百万美元的机器，特别是在二十年代后期和

〔1〕 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38页。——译者

三十年代早期。在这一时期，有許多苏联公民到西方去，在欧洲和美洲的学校和工厂里学习。三十年代后期，当大清洗引起的病态气氛籠罩着俄国的时候，西方技术的大量进口显著地减少了。但是四十年代早期又有大量西方技术輸入，构成英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提供的援助的一部分。

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毀1939年苏德条約，派遣軍隊入侵俄国，斯大林所耽心的战争終於来临了。战争一开始，苏联就遭到猛烈的进攻，在那可怕的头六个月中，苏联軍隊退到了莫斯科的大門。在生死存亡难卜的情况下，整个經濟都納入了战争軌道，其全面彻底远远超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所經歷的。在莫斯科所控制的地区內，尽一切可能把工业部門轉为軍事生产。除了人民最基本的必需品以外，一切商品都完全停止了生产。斯大林实行了一种严格的等級配給制度，按照每个公民对国家生存斗争的貢獻，以相应的比例来分配不充裕的粮食、衣著和燃料。对那些沒有参加軍役的人实际上也实行了軍事紀律。每个能劳动的城市工人，不分男女老幼，在战争期間每星期都要到軍事工厂从事六十小时或六十小时以上的劳动。战争期間的农业劳动力几乎完全是妇女、老人和儿童。在战争期間，由于过早死亡、飢餓、疾病和严寒，苏联的非战斗人口遭到了可怕的損失，同时在战斗的前綫上，大概有一千万以上正当壮年的士兵陣亡或受伤。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战争的轉折点，复苏了的紅軍开始向西推进，收复了以前淪陷的广大地区。收复的領土——以前曾是国家最肥沃和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在1944年到1945年期間已經变成劫后荒地，农田被破坏，工厂、住宅和运输綫大部分都被毀坏；此外，成百万居民患有营养不良症和疾病。一个巨大的重新建設的任务摆在面前，西方有許多人认为这个任务要几十年才能完成。

战争結束时，苏联人民盼望有一段休整时期，以便恢复十五

年来由于困苦和灾难所丧失的元气。但是，不論他們也好，西方的許多人也好，都沒有想到斯大林是怎样一个人，都沒有想到他的病态的心目中的世界的形象，都沒有想到他想統治世界的狂妄梦想。斯大林认为俄国仍然在敌人的包围之中，那些敌人就是不久前还和他一起抵抗德国和日本的同盟者。他也受到了邻国削弱的誘惑。1946年2月，斯大林公开宣布他的集中努力建設軍事实力的政策沒有改变。在国家疲憊得使人难以相信的情况下，斯大林宣布了俄国历史上最具雄心的經濟发展計劃。他声称只有苏联在十五年内把工业产量提高两倍，“我們才能认为我們祖国有了对付一切可能的意外事件的保证”，也就是抵抗侵略的保证。他以此来为他的計劃辯解。他用同样的伊索寓言式的但是可理解的語言說，努力設法掌握核武器一事将受到头等的重視，他断言：“我不怀疑，如果我們給科学家以适当的帮助，在不久的将来，他們不仅能赶上而且能超过外国的科学成就。”^③

斯大林已死了十多年，但是現在仍然使人强烈感受到他在战后集中力量建設現代化軍事实力的成效。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已拥有噴气飞机和原子弹，而且离开成功地爆炸氢弹只有五个月。1957年以及后来，造成苏联火箭和星际航行的成就的許多工作都是在斯大林指示之下計劃、进行和完成的。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他強調重建和扩大关键性的重工业和軍事工业的結果。这些工业帮助了軍事和經濟力量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三十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强加在苏联人民身上的枷鎖，在秘密警察恐怖的压力下，大体上都維持了下来。通常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經濟的，就是这种把国家全部力量主要导向战争准备的胁迫制度。現在我們来看看这个制度的主要特征。

第一，重工业对国家的全部資源有优先获得权。国家的大部分資金投資和最优秀的人力都用于扩大苏联鋼铁、电力、石油、机

器和軍备生产。为了使資金有可能这样极端地集中投放于重工业，只有很可怜的一小部分資金用于农业、住宅建筑和消費品生产。1949年当苏联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被国外測知的时候，苏联已是世界上鋼铁和电力产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它几乎不生产电气冰箱、洗衣机或电视机，并且它只制造四万五千輛汽車，而它的人口却超过一亿七千万人。在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核国家的那一年，它的工业为苏联公民生产的鞋子每人不到一双。另外，在被战争蹂躪过的西部地区，那时候因为缺少一般的房屋，成百万人仍然居住在岩洞、窩棚、东倒西歪的茅屋和其他临时搭盖的住所中。

第二，斯大林通过经济学家所謂的“强制儲蓄”，从人民身上榨取了苏联工业化所需的絕大部分資金。他操纵价格、工資和其他主要經濟杠杆，以便把大量的生产从消費轉到投資。这是通过計划制度实现的，上文已有述及，这个計划制度把資源主要分配給重工业。斯大林付給集体农庄和农民的产品的价格十分低廉，然后用高得多的价格在城市中重新出售，用这个簡單办法从农业中勒索巨大的利潤。例如，1936年苏联政府从某一个地区的集体农庄购买裸麦，每百公斤十三卢布，并征每百公斤八十卢布的营业税，即适用于食品和消費品的銷售稅，然后用每百公斤九十三卢布的价格出售給面粉厂，面包价格就是用这个成本数字計算的。在同一地区，集体农庄繳售小麦每百公斤可得十七卢布，加上国家征收九十卢布的营业税，使总价格达到了一百零七卢布。^④ 以上都是旧卢布价格。

由于食品和消費品的稅率特別高，它們的零售价格就十分高昂。为了补偿一部分，斯大林实行了低房租政策——一般是十分狭窄的住房，同时由国家支付医疗费。斯大林在世的最后几年中，父母还不得不支付子女的很大一部分教育費用。执行这个政策的結果造成城市中的实际工資很低，以致大部分家庭只有夫妻都参

加工作，才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斯大林在世的最后几年，大部分农民在集体农庄的收入很少，以致他們对生产沒有多少积极性。由此而造成的农业生产的落后状态产生了严重的粮食困难，斯大林政权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同这个困难仍掙扎了五年多。

第三，为了控制苏联人民和强迫他們工作，斯大林依靠了一种把胁迫、宣传、有选择的經濟刺激混合起来的办法。胁迫大部分是靠秘密警察，誰胆敢表示政治上或經濟上的不滿就有随时遭到处决或送到强迫劳动营中去的危险。在斯大林統治的很大一部分时期中，奴隶劳动制度也是一个重要的經濟因素，在这种制度之下，有数以百万計的政治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俘在各种各样的建筑工地、伐木場、矿場劳动，特別是在西伯利亚、中亚細亚、北极圈外。由此而造成的恐怖气氛籠罩着整个苏維埃社会，甚至影响到斯大林最亲密的合作者。赫魯曉夫在 1956 年 2 月的秘密报告中是这么說的：“斯大林是一个多疑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們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認識多年的党的杰出活动家。”^⑤

但是秘密警察并不能为建設苏联經濟提供必要的正面刺激。在这方面，斯大林依靠了物质的和心理的办法。他的宣传不断地提醒人民存在着外国进攻的危险，有必要作出个人牺牲，以便能使国家富强。爱国主义与最高限度的生产率等同起来。創造生产新纪录的人成了人民英雄，所享受到的个人声誉可以同西方的杰出运动员和电视明星相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刺激是极其悬殊的报酬制度，这成了斯大林主义的經濟的特点。斯大林把“平均主义”一詞变成了罵人的話；他硬說，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一个反映出劳动的质与量的不同的报酬制度，而不問这会造成收入多么不平等。斯大林在 1931 年咆哮道：“我們必須拟訂一种工資标准，它考虑到熟练劳动和不熟练劳动的区别，重劳动和輕劳动的区别。我們不能

容忍这样一种情况：炼鋼厂的一个炼鋼工人的收入一点也不多于一个清洁工人。”^⑥ 这个“工人的祖国”很快地成了一个收入极其不平等的国家。到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城市人口中收入最低的人每月只挣十到二十个卢布，这种人数以百万計，而另一极端只有一小撮人，每月挣一千卢布，甚至一千卢布以上。*

斯大林对于那些忠实地能干地为他服务的人是很慷慨大度的。他給他們舒服的住宅、僕役、汽車、在克里米亞不對公眾開放的休養地度假。甚至輕度累進的蘇聯所得稅也安排得使它不能嚴重地削弱有等級差別的收收入制度的刺激效果。不論你從斯大林主義國家中掙到的薪水多高，所得稅率也不超過13%。因此，高級官員、將軍、科學家、作家以及斯大林主義經濟的其他受益者的奢侈富裕的生活，同大多數人民的艱苦貧困的生活之間的顯明對比，一定引起了很大的羨慕和憤怒情緒。但是秘密警察虎視眈眈地站在一旁，隨時準備偵查和懲罰表示不滿意見的人。

當然，斯大林所能提供的最高報酬和最有力的刺激，實際上——而且甚至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只是為一小部分蘇聯人民提供的。對斯大林統治下的大多數臣民來說，強制，不論是經濟上的強制還是非經濟上的強制，是最有效的推動力。在他最後十五年統治的大部分時期，他是認識到這一點的，他通過了並且實行了世界上最嚴厲的一些勞動法律。這些法律禁止未經許可擅自曠工、上班遲到，禁止國家機關或國營企業職工未經許可擅自調換工作。違者遭到了坐牢、罰款等懲罰。另外還實行了一種勞動手冊制度——實際上是發給工人的一種工作通行證——使國家能對工人及其行動加以最大限度的控制。在農村里，貧困的農民想改善他們的處

* 這裡和本書以後各章所提到的盧布都是1961年1月1日發行的新“重盧布”，等於前十年中通用的盧布十個。這種“重盧布”名義上的兌換率是一盧布換一點——美元，但我們應用這一兌換率時必須非常謹慎。

境，集中精力去搞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中期被迫給他們的小小的自留地。这就威胁到了集体农庄的劳动力的供应；为了对付这种威胁，就通过了法律，規定集体农民在社会主义化的农田里至少必須做滿一定数量的最低限度工作日。簡而言之，斯大林所創造的事實上是一种二十世紀的工业封建制度，它的許多特点都使人想起一个世紀以前俄国的农奴制度。

斯大林通过秘密警察統治俄国，秘密警察不仅控制和監視苏联广大公民，而且也控制和監視有特权的共产党。但是要管理經濟，还需要其他的制度和机构，那就是集中在国家計劃委员会手中的計劃机构；按政府各部划分、大部分經濟根据經濟核算制——在一定意义上有点像西方的公司管理——經營的工业管理系统；監督非农业劳动力的工会；由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場組成的农业控制系统。

在斯大林喜怒无常和猜忌多疑的情况下，甚至最高級的經濟計劃工作者也是毫无办法的。生动的例子是1949年国家計劃委员会主席尼古拉·沃茲涅森斯基突然被撤去这个高級职位，开除出党。他不久就被逮捕，后来被秘密处决了。^⑦

1963年6月，赫魯曉夫总理这样描述了在斯大林統治下經濟計劃的实际情况：

我举一个事实來說明当时计划是怎样通过的。那是斯大林死前不久的事。部长會議开会要通过年度計劃，斯大林来参加会议。平常他是不主持部长會議的。这次他主持了會議。他拿起計劃草案的公文夾說道：“計劃就在这里。誰反对？”部长們面面相覷，不作声。“那就通过了。”斯大林說完會議就結束了。我們离开时，他說：“我們看电影去吧。”他到了电影院时說，“我們把他們好好地捉弄了一下！”誰被捉弄了？是部长們。

計劃失敗了。里面有很大的計算錯誤，因为部长們沒有实际参加計

划的起草，而且他們不同意这个計劃。其他看过計劃的干部也不同意这个計劃。但是斯大林本人并不太注意計劃工作問題，他也不想要別人太注意这些問題。^①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計劃委员会的专家們也沒有别的办法，只能临时凑合一些办法来实现斯大林的目标。他們所能应用的只是一些簡單粗糙的办法，显然并不受到經濟管理系統的其他部門的很多批評和检查。彼得·維爾斯教授称斯大林是手执算盘的卡夫卡⁽¹⁾，但是赫魯曉夫的证詞表明，斯大林甚至对算盘也很少胃口。因此，我們不必奇怪，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計劃有很多是现实和幻想的混合。每一个五年計劃都为重工业和那些为人民需要服务的工业——輕工业、农业、住房建筑等等——規定了发展的道路。但是在执行計劃的过程中，事情就变得很清楚，国家根本沒有一切必要的資源来达到計劃的全部指标。解决办法很簡單，也很典型。农业的指标、住房建筑的指标、消費品生产的指标，为了方便就被置之脑后了，一切可能弄到的資源就都集中使用在重工业上、武器生产上和斯大林某一时候所最心爱的給人家看的工程上，例如三十年代建筑的莫斯科地下铁道。

在斯大林晚年，經濟分析已奄奄一息，因为他对此很少胃口，而且苏联經濟学家知道，他們的任务只不过是頌揚和复述他們的主子关于經濟的发言。这种情况使苏联計劃工作思想貧乏混乱，斯大林本人就在 1952 年作了生动的描述：

不久以前，为了植棉业的利益，曾經决定調整棉花和谷物的比价，調整出售給植棉者的谷物价格，并提高交納給国家的棉花价格。于是，我

(1) 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波希米亚象征主义作家。——譯者